

日本前近代史视野下的环境史研究*

王海燕

【提要】 随着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兴起环境史研究以后,日本史学界的环境史研究也日渐兴盛。日本史学界对环境史定义的认识,是通过不断的摸索和讨论而逐渐明确化的。目前,有关环境史是探究人类与自然相互影响的关系史的定义,在其学界得到广泛的认同。日本前近代史视野下的环境史的研究视角,多集中在社会经济史、灾害史和心性史三大视域;研究方法也不仅是历史学的实证主义,而且还引入考古学、地理学、社会学、民俗学、生态学等其他学科的方法。虽然日本史学界的环境史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是尚不具备独立成“学”的独特视角和方法论。

【关键词】 日本 环境史 人与自然的关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欧美学界兴起环境史研究。随后,日本学界也相继展开环境史研究,并逐渐兴盛,研究成果显著。

我国学者对日本环境史研究状况的介绍并不多,以笔者所见,目前国内有关日本环境史学史的介绍最为详细、具有独特见解的是包茂红所著的《环境史学的起源和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九章“日本环境史研究”。该文从公害史、农业和农村环境史、文明论三个视角,阐释日本环境史的动向,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和总结出日本环境史研究的特点和问题。然而,该文对日本前近代史^①研究中的环境史动向却着墨不多。在日本现代历史学的发展中,前近代史研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对前近代史研究中的环境史动向的把握,有利于全面了解日本环境史的发展轨迹。

众所周知,环境史研究属于跨学科研究,非单一学科的课题。日本的环境史研究亦是如此,从自然科学领域至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都有研究者参与,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都具有其专门领域的独自特点。以笔者有限能力,实难把握各个领域的研究状况,因此本文仅从前近代史的视野,对日本史学界的环境史研究的状况和特点作一粗略的概述。

日本学界首次正式出现“环境史”一词是在 1982 年。当时,科学史研究者中山茂发表《环境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日本古代灾害社会史研究》(13BSS018)的成果。

① 在日本史学界,关于日本史断代有两种方式:一是分为“古代”、“中世”、“近世”、“近代”、“现代”;二是将“古代”、“中世”、“近世”合称为“近代以前”或“前近代”,将“近代”和“现代”合称为“近现代”。一般而言,学界认为 1868 年是日本近代的开始。本文焦点是当今学界有关日本近代以前灾害的研究,故采用“前近代”的表述方式。

史的可能性》一文,介绍了美国环境史的研究动态,并认为环境史的目的,与其说是创立一个完全崭新的学科,不如说是从以往被学界否定的视点,由自然、社会、人文等领域共同进行跨学科研究,以期重新认识历史。关于环境史的研究对象,中山氏提出自己的主张,认为至少应包括四个方面:1. 人类对于自然的态度变化;2. 作用于自然环境的经济活动的效果;3. 自然保护、环境保全运动的历史;4. 生态史学与环境保全运动之间的关系。^① 中山氏虽然也意识到环境史是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历史,但在其环境史定义中,更关注的是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态度及影响,自然被视作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客体。也就是说,中山氏所言的环境史,并没有突破传统的以人为中心的历史学框架。

“环境史”概念引入日本学界后,尽管不断有学者将环境史的视角纳入各自的研究领域,但是将其作为学界的共同论题,却是始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1991年,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组织的共同研究课题“地球环境的变动与文明的盛衰——探求新的文明范式”正式启动,吸引了众多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学者参加,其研究成果是梅原猛等编的《讲座文明与环境》(全15卷),于1995年至1996年相继出版。1995年,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历史研究部设立环境史研究部门,启动了“日本历史上的环境与人类生活的综合研究——日本历史上的灾害与开发”课题,其研究成果是平川南主编的《〈共同研究〉日本历史上的灾害与开发I》、《〈共同研究〉日本历史上的灾害与开发II》,分别于2002年和2004年刊行。^② 1997年11月,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举办了“过去1万年间的陆域环境的变迁与自然灾害史”国际研讨会,以自然科学、考古学为中心,从环境变迁史的视角,探讨历史时代的环境变迁、日本列岛及其周边地域的环境变迁等,会议论文收录在《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研究报告》(1999年刊行)中。1998年5月,《民众史研究》第55号出刊了“特集环境史的视界——以日本中世为中心”。2000年,民众史研究会召开的年度大会的主题是“环境史的可能性”,年会的成果收录于《民众史研究》“特集环境史的可能性”(2001年1月)中。2003年,增尾伸一郎等编的《环境与心性的文化史》(上、下)出版,该书汇集了历史学、文学、考古学、民俗学、宗教史等领域的32位学者的研究成果。2011年,汤本贵和总编的《系列日本列岛的三万五千年:人与自然的环境史》(全6卷)刊行,全系列从历史学与生态学的视角,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日本列岛生物多样性形成原因中的地位。2012年至2013年,平川南等编的《环境的日本史》(全5卷)问世,该书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史的视点,叙述自古至今的日本列岛历史。

随着环境史越来越受关注,日本学界关于环境史的定义也渐趋明确化。在环境史引入之初,日本学者对环境史的理解各有不同,既有学者将环境史定位于“环境保护运动或思想的历史”,也有学者认为环境史是“探索人类社会与生态体系之间关系”的历史。^③ 此外,源于欧美的“环境史”一词,在日语的语境中,很容易被理解为“‘环境’的历史”,而不是“‘人类’的历史”。因此,一些日本学者

① 中山茂:“环境史的可能性”,《歴史と社会》第1号,1982年,第161—183页。

② 另外,《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研究报告》(87)(2001年)也与环境史研究有关,即篠原彻编《〈共同研究〉日本历史上的劳动与自然》。

③ 参见小塩和人:《水の環境史—南カリフォルニアの二〇世紀》,玉川大学出版部2003年版,第296页。

避免使用“环境史”概念,而采用“环境历史学”^①或“生态史”等名称。即使是使用“环境史”这一术语,也因使用者的不同,其被赋予的含义也不尽相同。^②进入21世纪以后,环境史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史”的基调,得到日本学界的广泛认同。^③关于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中心的环境史,篠原彻认为应内含三种关系:^④一是围绕自然尤其是在人统治人的延伸线上的作为资源的自然环境史;二是围绕对峙于自然且从自然获取食物的人与自然的直接关系的环境史;三是围绕包括人类影响的自然(环境)其自身构成要素间关系的环境史。但是,关于第三种关系的研究,篠原氏并未明确阐释环境史与生态史的区别。

2012年,在北原系子等编的《日本历史灾害事典》中,北条胜贵对环境史作了四点定义:^⑤1. 环境史以自然与人类相互影响构筑世界的视点来叙述、探讨历史过程;2. 环境史是跨学科的学问,需要历史学与考古学、地理学、民俗学、生态学、生物学、气候学等领域相结合,实行共同合作研究;3. 环境史的叙述对象不能仅限于人类,也应包含与人类活动相关的植物、动物以及石、山、川、海、空等;4. 环境史的研究需要考虑环境的伦理,借鉴环境哲学、环境伦理的理论思想,重构历史的概述方式。北条氏定义,可以说是在30年来日本环境史研究成果基础上的归纳总结,强调人类与自然的相互关系,突破以人为为主的历史学方法,关注自然、动物等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与地位。

二

日本学者对环境史定义的不断探索,反映出日本史学界对环境史研究的逐渐关注与推进。以探究人类与自然相互影响的关系史为主旨的日本环境史研究,其研究视角大致归纳为以下三大主流。

1. 社会经济史视域

在日本史学界,首先积极地推动环境史研究的是中世史研究者。一提起日本的中世,就会浮现“庄园”、“领主”、“村落”、“开发”等象征其时代特征的词汇。中世的庄园以集落为中心,有机地统括耕地和山野河海,实现人和土地的统一,虽然土地是私有制性质,但庄园同时也发挥着统治人民的作用。^⑥庄园制作为日本中世政治社会体制,一直以来都是“二战”后日本中世史研究的核心课题。从环境史的视角来看,庄园本身就是人与自然环境相互影响的存在。中世的环境史作为庄园史的延

① 关于“环境历史学”概念,饭沼贤司定义道:“(环境历史学)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史或者是推量二者间距离感的历史。这里所言的‘环境’是指人与自然交流中形成的总体。如果将人对自然作用产生的事物作为广义的‘文化’,而自然一侧形成的环境作为自然环境,那么‘环境’则内涵文化与自然环境。以这样的‘环境’为中轴,探求历史的再建构即是环境历史学”。饭沼贤司:“环境历史学序说—庄园の開発と自然环境”,《民衆史研究》(61),2001年5月,第3—31页。

② 例如,在东京农工大学,“环境史”的含义是指“环境文化史”(高橋美貴:“環境史研究の意義と課題—環境文化史と生業民俗学”,《ESD 環境史研究:持続可能な開発のための教育》4,2005年9月,第9—18页)。

③ 民众史研究会“环境史的可能性”研讨会上,水野章二做了基调查报告,主题是“人と自然の關係史素描—平安末—近世初の環琵琶湖地域から”;翌年,水野氏论文《人与自然关系史的素描——以中世后期环琵琶湖地域为中心》刊载于《民衆史研究》(61),2001年5月,第33—60页。

④ 篠原彻:“環境史は可能か—生活世界の視点から”,《歴史評論》650号,2004年6月,第55—61页。

⑤ 北条胜贵:“災害と環境の歴史”,北原系子等编:《日本災害史の事典》,吉川弘文馆2012年版,第152—159页。

⑥ 佐藤泰弘:“莊園制と都鄙交通”,历史学研究会、日本史研究会编:《日本史講座3 中世の形成》,东京大学出版会2004年版,第97—130页。

伸,或从自然的观点,或从人类社会活动诸行为的观点出发,讨论庄园制下的人与自然之间的诸关系,由此派生出开发论、景观论、生业论等多种视角。

开发论认为,农业社会成立后,开发改变自然环境是人类创造、完善自身生活环境的非常重要的历史过程。对自然环境的开发,不仅要涉及劳动力的构成,而且还包含开发所使用的劳动工具的技术水平以及劳动工具的所有者等问题,因此开发是历史学分析各历史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的非常重要的视角。日本环境史在讨论开发与自然的关系时,存在两个研究方向:一是关注开发给人类社会生活所带来的积极影响,考察人们通过开发改变、克服自然环境的限制,建造出有利于人们社会生活发展的环境;二是重视开发的负面影响,探讨开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

景观论认为,开发行为的结果,在视觉上就是原有自然景观被改变,新的景观形成。景观论是将景观作为开发的结果来认识,关注人类利用自然地形进行的集落、耕地、水利、交通等开发,结合地质学、地理学、考古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复原历史的景观,比较开发前后的景观的共通点与不同点,探索开发对同一地域人们的经济活动及生活的影响。^①当然,造成环境景观变化的因素不单是人类的开发,还有自然界本身的运动(地震、火山喷发等)。但是景观论的主要关注点依然是庄园、村落,将其作为人类开发的景观,在继承庄园史、村落史的庞大研究成果基础上,通过复原庄园或村落内的集落、建筑物的形态与领主居馆间的关系、耕地、土地区划、用水设施及施工过程等方面的景观,讨论庄园或村落内的诸建筑物的社会作用,以考察地方社会的实态。^②

生业论认为,开发改变自然景观意味着民众所居的自然环境或生活环境变化,也会联动民众的经济生产活动。生业论是结合民众史、环境史与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视点。在“二战”后的日本史学界,民众史研究得到发展,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引入,民众史研究的焦点从民众运动、民众斗争移向民众的日常性生活,即通过民众生活和生产活动的诸侧面,关注民众集团的形态及集团性的心性等。^③2005年至2007年,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启动共同研究课题“关于生业、权力与知识体系的历史研究”,其研究成果《从生业看日本史——新历史学的射程》(2008年)从生业的视点出发摸索民众史研究的新方法论,探究为了生存、生计的民众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关于生业的概念,民俗学、考古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理解存在不同,即使是环境史研究学者的解释,也因人而有微妙的差异。但学者间对生业概念的理解具有共识点,即生业论关注的是人类生产活动与作为资源的自然之间的关系。由于强调民众的主体性生产活动,因此在生业论视点的环境史研究成果中,多以在山野河海的非农业的多样生业活动为研究对象。但是近代以前的日本社会生业中,农业占有相当高的比重,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深入探讨农业与非农业的生业发展或衰退之间的关联。生业论作为民众生活史研究的方法论,如何在社会经济史、环境史研究论点上进一步提出新史实、新课题,还有待于今后的研究。

① 青山宏夫:“景观からみる水辺の環境と「開発」”,井原今朝男编:《環境の日本史3 中世の環境と開発・生業》,吉川弘文馆2013年版,第88—113页。

② 水野章二:“中世村落の構造と景观”,历史学研究会、日本史研究会编:《日本史講座4 中世社会の構造》,东京大学出版会2004年版,第139—166页。

③ 永原庆二:《20世紀日本の歴史学》,吉川弘文馆2003年版,第236—240页。

2. 灾害史视野

以人类与自然的复合交互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日本环境史中,自然灾害给人类社会所带来的冲击以及人类克服自然灾害的历史越来越被重视。在灾害史观点的研究中,气候变动与社会变化之间的关系是重要的课题之一。1976年,气象学者山本武夫在其著作《气候叙述的日本历史》中复原古气候,并推论长期的气候变动与中世的社会繁荣抑或自然灾害等历史事件之间存在相应的关系。此后,矶贝富士男依据海进海退变动曲线,提出气候变动论,用以解释历史的气候变化与中世农业生产力的关联,主张镰仓后期以后,气候冰凉化导致农业生产力后退、停滞。^①日本的中世一直被学界认为是农业生产力向上发展的时期,因此矶贝氏说具有颠覆性。但是,矶贝氏的研究存在局限性,一是其学说立足点是中世奴隶制论,这一点在日本史学界支持者甚少;二是其在运用气候学成果与文献史料的手法上,存在不成熟性。^②

不过,日本环境史研究的先驱者之一峰岸纯夫支持矶贝氏的见解,从自然环境和生产力的视点,将中世划分为四期:^③中世初期(11世纪后半叶—12世纪),气候温暖时期,稻作北传,大开垦时代,庄园公领制成立;中世前期(13世纪),气候寒冷化时期,饥谨、凶作频发;中世中期(14世纪—15世纪前半叶),气候呈现一定的温暖化时期,生产条件有一定的恢复;中世后期(15世纪后半叶—16世纪),气候寒冷时期,生产条件恶化,饥谨频发,庄园公领制解体。峰岸氏的分期,勾画出温暖—寒冷—温暖—寒冷的气候波动与农业生产条件的有利—不利—恢复—恶化的变化对应关系,及其对中世庄园制的成立和解体的影响,尤其强调气候寒冷化的灾害性。但是从气候与灾害的关系来看,气候温暖化不一定会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因为同样具有导致疫病、干旱、虫害等灾害的可能性。^④气温不是唯一影响农业生产的气候因素,考察降水量等其他气候因素的变动,对解析气候与社会关系也是必不可少的。^⑤

与气候变动过程的长时段性相比,地震、火山喷发、海啸、干旱、水灾等突发性自然灾害,对人类及其生存环境造成的冲击力或破坏力或许更加明显,同时在与灾害抗争的过程中,诸社会集团的力量受到考验,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1983年,北原系子著《安政大地震与民众——地震的社会史》,从灾害社会史的视点,以江户时代安政大地震为例,讨论了受灾程度与灾害信息的社会阶层性,以及灾害暂时打破日常的身份制社会结构,不同阶层为了实现社会再建共同构筑“灾害理想国”的社会现象。2006年,北原系子主编的《日本灾害史》集合了历史、考古、农业、宗教等领域的研究成果,探究以人为主体的灾害史,其中特别关注灾后的社会或人们实现生活恢复、复兴的历史。2012年,北村优季著《平安京灾害史:都市的危机与再生》,从灾害造成都市布局变貌、人口流动及灾害观变化的

① 矶贝富士男著《中世の農業と気候—水田二毛作の展開》(吉川弘文館2002年)一书收录了著者有关气候变动对农业影响的诸篇论文。另见矶贝富士男:“気候変動と中世農業”,并原今朝男编:《環境の日本史3 中世の環境と開発・生業》,第1—33页。

② 峰岸纯夫:“自然環境と生産力からみた中世史の時期区分”,《中世災害・戦乱の社会史》,吉川弘文館2011年版,第25—42页。高木徳郎:“日本中世史と環境史”,《歴史評論》630号,2002年10月,第15—27页。

③ 峰岸纯夫:“自然環境と生産力からみた中世史の時期区分”,《中世災害・戦乱の社会史》,第25—42页。

④ 西谷地晴美:“中世前期の温暖化と慢性的農業危機”,《民衆史研究》(55),1998年5月,第2—22页。

⑤ 中塚武:“気候変動と歴史学”,平川南编:《環境の日本史1 日本史と環境—人と自然》,吉川弘文館2012年版,第38—70页。

角度,讨论平安京在灾害洗礼中的演变与发展。2013年,安田政彦著《灾害复兴的日本史》,关注在自然灾害中重生的自古至今的日本历史。总的来看,目前日本史学界的灾害史研究的主要大方向之一是灾后社会重建史和防灾史。

灾害史视点的另一个重要研究方向,是基于“人类破坏自然环境”论点,探讨人类的开发对自然环境所产生的负面影响。1987年,义江彰夫在《朝日新闻》撰文指出,“所有民族的文明与进步历史,同时也是征服自然、破坏自然的历史”。^①这一观点在不少日本环境史研究成果中都得到具体性的论证。例如,水本邦彦从近世的农业生产和城市建设对草木大量需求的历史现象入手,说明人类对山野过度的开发、利用,造成山崩、泥石流等灾害,甚至导致淀川水系河道阻塞,成为影响国家统治的大问题。^②开发与灾害的视点立足于将人类与自然置放在对峙位置的立场,探究人类破坏自然以及自然损害人类生活的历史。

3. 心性史视角

文化是环境史研究中的另一重要主题。“环境中人类引起的变化,事实上总是在文化状态中回荡并产生变化”。^③日本学者也非常重视自然环境与文化的关系,平川南曾明确指出:“为了从根本上重问我们的自然观、环境观,获得开拓未来的展望,从人与自然关联的历史视点研究日本的历史、文化最为重要。”^④

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自然观)既映像于信仰、宗教、习俗、文学、绘画等文化表现中,也体现在日常生活、生业及景观等生活性的环境认识中。因此,关于日本列岛上的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及其变迁,考古学、日本文学、民俗学、地理学等学科也都有研究成果,为历史学提供多样的视点。^⑤

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以心性/心性史的视角探讨自然与人类、自然与文化相互关系的研究成果引人注目。北条胜贵、工藤健一等研究者借用法国年鉴派的心性概念/心性史理论方法,探究人类的心性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主张心性是连接自然与文化的媒介,在对环境的认知与行动即实践中生成、变化。^⑥作为日本环境史研究的新潮流,使用“心性”概念的论著并不多,前述的增尾伸一郎等编的《环境与心性的文化史》(上、下)可以说是心性史研究的标志性成果。其构成包含两大部分:一是以人类对环境的认识为主题,从人类的自然观、世界观、宇宙观等问题入手,探讨环境、心性、习俗之间的相互作用;二是以环境与心性的相互关联为主题,从信仰、祭祀、礼仪、神话传承等侧面,讨论人类改变山林、水域,构筑农耕空间、都市空间等实践行动与心性的关系。

① 义江彰夫:“自然破壊を視点に新しい歴史観を”,《朝日新聞》1987年8月24日夕刊。

② 水本邦彦:《草山の語る近世》(山川出版社2003年版)、“人と自然の近世”(水本邦彦编:《環境の日本史4 人々の営みと近世の自然》,吉川弘文馆2012年版,第8—38页)。

③ J. 唐纳德·休斯:《什么是环境史》中文版序,梅雪芹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页。

④ 平川南:“人と自然のかかわりの歴史—『環境の日本史』の視座”,平川南编:《環境の日本史1 日本史と環境—人と自然》,第1—36页。

⑤ 关于日本人的文化、精神世界与自然的关系,柳田国男的民俗学以及和辻哲郎的“风土”论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即开始有论及。

⑥ 北条胜贵:“自然と人間のあいだで—〈実践〉概念による二項対立図式の克服”,增尾伸一郎、工藤健一、北条胜贵编:《環境と心性の文化史》下,勉诚出版2003年版,第1—30页。

心性史视角的环境史研究的特征,是不同于以往的历史学多与自然科学携手共同研究的环境史模式,而是积极地推进历史学与民俗学、文学、思想史等的对话。^①此外,心性史的研究动向之一是对以往历史学的认识进行根本性的批评。例如,佛教、神道提倡的“人类与自然共生”思想,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日本人对自然的伦理观的核心,受到今人的高度评价,心性史学者则尖锐地指出:在日本前近代历史中,共生思想在抑制民众的大开发倾向、保护自然方面确实起到积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使寺院、神社主导的耕地开发正当化;同时,共生思想加速了自然环境与神佛一体化,有可能助长民众对自然环境的依存心理,一旦对乡土自然的爱恋与民族主义结合,单纯的情绪就会以“传统”之名被绝对化,共生思想也就沦为道具。^②

三

以上是从日本前近代史视野对日本史学界环境史研究动向的初步整理。在此基础上,笔者拟对日本史学界的环境史研究特点作如下归纳。

1. 日本的环境史是以“环境: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主题的历史学研究,但尚未成为“新的历史学”的全体史。虽然有些学者极力提倡“环境历史学”概念,^③不过,独立成“学”需要有独特的视野与方法。前已叙述,日本环境史研究聚焦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史。对此,宫泷交二指出:人与自然的关系史不是一个新的历史观,20世纪曾对日本历史学影响重大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最重视的是生产关系,而决定生产关系的生产是人们通过劳动手段改变自然的过程,生产实态的解析即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史。^④目前的日本史学界的环境史研究成果可大致分为两类:^⑤一是直接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环境史研究;二是以环境史的视点,论及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研究课题。在研究手法上,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不同的研究者根据各自研究的侧重点,都在某种程度上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如考古学的实地调查、历史地理学的景观复原、民俗学的生业研究,等等,但是这些方法在环境史以前已经存在,因此可以使“环境历史学”成立的独特方法论直至目前尚没有形成。

2. 近年来,日本史学的环境史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庄园史、村落史、生活史、都市史、文化财产保护等领域。庄园史、村落史一直以来都是日本战后历史学的最重要研究领域之一。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学者开始逐渐意识到近代史学的局限性,进入20世纪70年代,经济高度增长给当时的日本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环境破坏、公害、犯罪增加等),使得对经济高度增长持否定态度的人日益增多,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日本史学界迎来了社会史研究的浪潮。^⑥日本的社会史研究通过各历史时期

① 高木德郎:“日本中世環境史研究の軌跡と本書の位置”,《日本中世地域環境史の研究》,塙书房2008年版,第11—48页。

② 増尾伸一郎、工藤健一、北条胜贵:“〈環境と心性の文化史〉へ向けて”,増尾伸一郎、工藤健一、北条胜贵编:《環境と心性の文化史》上,勉诚出版2003年版,第1—36页。

③ 飯田賢司:《環境歴史学とはなにか》,山川出版社2004年版。橋本政良編:《環境歴史学の視座》,岩田书院2002年版。

④ 宮泷交二:“「環境史」・災害史に踏み出した日本古代史研究”,《歴史評論》626号,2002年6月,第60—65页。宮泷交二:“村落と民衆”,上原真人等編:《列島の古代史3 社会集団と政治組織》,岩波书店2005年版,第45—77页。

⑤ 宮泷交二:“村落と民衆”,上原真人等編:《列島の古代史3 社会集団と政治組織》,第45—77页。

⑥ 永原庆二:“現代歴史学の展開”,《20世紀日本の歴史学》,第193—221页。

的民众诸集团(共同体)及其内聚原理、习俗、心性等侧面,关注多层的、多元的社会机能与秩序。从这个意义上看,日本环境史研究延续着社会史研究的视角。

3. 灾害史研究的急速成长。日本前近代史的环境史研究的活跃化,是与现代日本社会的环境问题及相关的危机意识有着密切关联的。^①“现在的我们,在面对人类史上未曾有的全球规模的环境问题的同时,也继续承受着以往的自然灾害的影响”,“历史学是直接关联现在及将来生活的有益学问”。^②日本列岛地处灾害多发地带,历史上频受地震、海啸、火山喷发、台风、洪水等自然灾害的袭击,防灾、应灾及灾后建设一直是贯穿日本历史发展过程的课题。“历史学的作用不单是通过追溯过去以解释现代社会的诸问题,并且也是通过新的视点重新释读过去,发现克服现在问题的方法”。^③1995年“阪神·淡路”大震灾、2011年日本东部大地震和福岛核泄漏事件等灾害发生后,越来越多的研究日本前近代史的学者意识到灾害史研究的重要性,促进了灾害史研究的活跃化。

4. 环境史共同研究项目的推进。战后日本学术研究体制的特征之一是大型的共同调查、研究及其相关的官方组织或机构的设置,依靠个人力量无法实现的大型、跨学科的调查事业得以推进。其中,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即是日本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力量。自1995年以来,以该博物馆为中心的有关环境史共同研究项目延续不断,每年都在进行,有力地推动了日本史学界环境史研究的兴盛,对研究力量和成果的蓄积起着重要的组织作用及广泛的影响力。此外,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文部科学省、日本学术振兴会对环境史研究的集体或个人项目的资助不断增加,反映出对环境史研究的支持。^④

2011年日本东部大地震、福岛核泄漏事件之后,包括日本史学在内的日本人文社会科学界,出现了重新认识环境史、灾害史的动向。可以预见,在三十年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日本史学界的环境史、灾害史研究,将迈进更为深入的新阶段。

(作者王海燕,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邮编:310028)

(责任编辑:王旭东)

(责任校对:董欣洁)

① 关于日本社会学、民俗学的环境史研究兴起之源——公害史研究,包茂红的“日本环境史研究”(《环境史学的起源和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6—216页)已有详细介绍,在此不再赘述。

② 宫泷交二:“环境史・灾害史からみた古代東国の村落と民衆”,《学习院史学》43号,2005年。

③ 高木德郎:“日本中世環境史研究の軌跡と本書の位置”,《日本中世地域環境史の研究》,第11—48页。

④ 根据日本国立情报学研究所网上公开的日本文部科学省、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助成事业数据库(KAKEN:科学研究費助成事業データベース<http://kaken.nii.ac.jp/>),日本史学科获得的资助项目中,关键词含有“环境史”一词的项目共29项,其中27项是在进入21世纪以后获得立项资助的。